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三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〇〇期 ——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10d)

---

【读史笔记】读《聂荣臻回忆录》	单世联
【前事不忘】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马失途
【资料汇编】文革中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欧阳龙门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读史笔记】

读《聂荣臻回忆录》

• 单世联 •

聂荣臻是“文革”后较早写作回忆录的领袖级革命家。历时数年的《聂荣臻回忆录》1983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后，受到邓小平的好评。其中有关林彪及1969年“第一个号令”的详细内容，是高级领导人中第一个以个人的名义对林彪及“文革”期间一些重要事件的评论，因此特别引人注目。战士出版社后来改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军队领导人的回忆录。也可以说，《聂荣臻回忆录》是一个范本。

◇ 血统论

1967年2月怀仁堂碰头会上，聂荣臻等老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行为提出激烈批评。此事初以“二月逆流”、后以老一辈革命家反对“文革”而著名。谭震林首先说：“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又是什么？”（徐向前，1987：833）聂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聂荣臻，1983：855）

2月16日，李先念也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聂荣臻，1983：855—856）

十七、八的娃娃不是反革命，但他们确实是可以参与政治斗争的。十多岁就参加革命的人多得很，红七军团团长寻淮洲牺牲时才22岁。“血统论”原是“自来红”的干部子弟提出的，因为他们的老子是英雄，所以他们也是好汉。《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干部子弟并没有意识到是大祸临头。他们原以为“文革”无非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把1949年已推翻的旧政权中的残渣余孽重新来一次大清扫。而他们自己天然就是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动力。于是，“北京各大学、中学几乎都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而默契的现象：敢于出来给校党委、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干部子弟’。例如：在清华园给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贴大字报，将其定性为反革命黑帮的，就是刘少奇和贺龙的孩子。再例如，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一个出来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是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双，2000）他们与父辈派出的工作组密切配合，想按照自己的构想来运作文革，具体地说就是重复1957年反右的过程，以期打倒一批走资派和黑五类后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

但1966不是1957，革命在深入。在毛指责工作组是“白色恐怖”，中央文革小组掌管了“文革”领导权，运动的矛头指向各级当权者直至刘少奇后，第一批红卫兵即干部子弟发现，他们的父辈和他们自身都大难临头。看着父辈们诚惶诚恐的样子，这些在父辈特权中宠养大的孩子，普遍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了的情绪。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谈论父辈昔日的光荣业绩，从父辈的辉煌中汲取力量，从朋友的话语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依托。他们为父辈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也为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大为光火。在愤怒的驱使下，他们把仇恨百倍地发泄到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的身上，“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应运而生。“血统论”的骁将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诞生，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1966年10月，他们成立了一个叫“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试图在父辈倾覆之际反抗中央文革、捍卫爹娘。为了表示血统的高贵，他们把父兄的旧军装和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宽大的军衣上紧束着宽皮带，有的还穿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他们摆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开口则满嘴“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的粗话，一方面制造“红色恐怖”，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籍中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他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互相激励：“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另一方面直接对抗整肃其父辈的中央文革：“戚本禹十七级，你他妈的算老几？”在中央文革抓捕了部分成员之后，“联动”更加嚣张纵恣，于1967年1月11日六次冲击公安部。

1967年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专政机关大肆抓捕“联动”。

这就是谭震林、聂荣臻、李先念为高干子弟鸣不平的背景。

“黑五类”的子弟受迫害是“血统论”，抓捕无法无天的干部子弟也是“血统论”：子弟们的命运取决于父母。“血统论”理所当然受到从党的领导人谭震林等到青年工人遇罗克的批判，但“血统论”在中国就是有生命力，像“文革”这样要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大革命”也不能铲除。既然老干部不能全部打倒，他们的子弟也就要放出来。于是，毛泽东亲自下令，1967年4月下旬，近百名“联动”分子被放出来，被送到人民大会堂。江青流着眼泪对他们说：“你

们受委屈了”；周恩来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抓“联动”“是不教而诛”。此后不久，“十七级”干部戚本禹被抓，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平民造反派蒯大富等人像土匪一样被全部下放；批判“血统论”的遇罗克被枪毙。

#### ◇ 山头

山头峥嵘，风必摧之。朱德长期不参与军队的具体领导，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山头”，所以毛对他比较放心。但对其他人就不一定了。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毛泽东支持林彪打倒杨成武等人，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康生进而提出要挖杨成武背后的“黑后台”，由此掀起了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聂荣臻呼之欲出，处境艰难。同样，1967年“七二〇事件”后，林彪以批陈再道搞“兵变”入手把矛头指向陈再道的上级徐海东—徐向前，意欲横扫四方面军的“山头”。

到“文革”时为止，众多山头已被平得差不多了：

红军时代的“山头”：一方面军朱毛；二方面军贺龙；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一方面军内部的彭德怀的三军团“山头”已于1959年铲平。二方面军规模最小，抗战后不久即被分解，但因贺龙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而一直保持到“文革”；四方面军虽说在1937年就被严格限制，但许多高级将领还是活跃在军队中。所以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山头”是主要要平的对象。

抗战时期的“山头”：新四军的陈毅已经转业到外交岗位，一二九师的刘邓早已不直接参与军委领导，所以要铲平的是贺龙的一二〇师（即红二方面军）和晋察冀的聂荣臻。

解放军时代的“山头”：彭德怀的在西北和志愿军的“山头”1959年已被铲平，陈毅、刘邓等人的工作也已分别与华东、晋冀鲁豫山头分离，剩下的还是聂荣臻的“华北”山头。

总之，“文革”要平的主要是贺龙“山头”、聂荣臻“山头”和虽无领袖但高级将领甚多的四方面军“山头”，以此来保持一军团、一方面军和四野“独尊”地位。但林彪没有考虑到，当他以“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为口号铲除异己“山头”、全面突显自己的山头时，也就酝酿着自己要被彻底铲平的后果。当林彪通过陈再道把矛头指向四方面将领时，毛泽东就已经出面保了陈再道。

“山头”有弊也有利。有了山头不但可以支持自己的地位，平时也可得到关照。49年后，一批又一批高级领导被打倒，他们的处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者与他们的历史渊源。1969年10月，聂被疏散到河北邯郸，“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与聂的良好处境不同的是，朱德到广东从化，“实际上等于软禁”，（聂荣臻，1983：863）原因很多，广州没有他的亲信部下也许是一个原因。此时的广州军区，属于林彪的势力范围。本来林彪的老部队除在广州军区的41军、42军、47军和55军外，还有沈阳军区中的39军、40军、46军，北京军区中的38军，武汉军区的43军和54军以及成都军区的50军是原四野的部队，但大军区司令员中只有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和丁盛是四野出身（文革中多了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但两个军区的基本部队不是四野系统的）。所以“九一三”事件前，林彪要与毛泽东决裂，除了广州军区，无处可去，要不就得叛国。

#### ◇ 林彪

1932年3月聂到一军团任政委，林彪由四军军长提升为军团长。“我在黄埔军校就认识

林彪，北伐到武汉后，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我的手分配的。”在此后四年的合作中，聂对林有清楚的认识，他的评论是权威性的。

初步印象：“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1983：147）

第一次争吵：32年4月，打下漳州后，林纵容一些部队违反政策，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拷打。聂反对这种做法，林彪反问：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支持博古、李德。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前，大约是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大会上大讲了一通阵地战。干部们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聂荣臻，1983：202）

长征路上的不负责任。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一军团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和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但林不执行命令，不占领九峰山，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我平时总认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政治上存在很大的弱点——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是很忠诚，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聂荣臻，1983：218）

反对毛泽东。35年5月上旬，林彪在会理先是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被彭德怀回绝后，又写信给中央，要求朱毛下台彭德怀上台，还要求聂在信上签名。毛后来对他的批评是：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

支持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聂和林有一次在张国焘的代表陈昌浩处吃晚饭，陈让林彪先走，要聂留下来谈一谈。“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当聂提醒他注意路线问题时，“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聂荣臻，1983：283—284）

对形势悲观。35年12月中旬，林彪写信要求到陕南打游击。“这封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认为他同中央有分歧，要他改变主意，但他仍不死心。”（聂荣臻，1983：301）聂劝说后，他根本听不进去，以后态度一直比较消沉。

拒绝毛泽东的指令。36年春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东征，因十五军团伤亡大，毛要求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1983：315）

违抗毛泽东迅速进关的命令。48年，林彪不听毛泽东的指令，“把东北的主力放在沈阳、长春之间拖来拖去，白白浪费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时间。”（聂荣臻，1983：685）

对北京的和平解放态度消极。林彪认为和平解放是幻想，不可能实现，还是靠要打来解决问题。（聂荣臻，1983：701—702）

总的说，聂对林印象不好：“他平时又是一个不爱多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

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又有些鹰鹗。”（聂荣臻，1983：300）

从这几件事看来，林彪对毛并不是亦步亦趋，不但与60年代后大搞个人迷信有区别的，甚至还有反毛言论与行为。毛的识人术无用怀疑，聂知道的事，毛肯定知道，但他对林仍然信用有加，既说明林作为一名领导人有权利向毛提意见，而毛也并不是完全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至少在战争年代。问题是，博古、张国焘、彭德怀等人因其与毛的不同意见而成为毛耿耿于怀的，为什么林彪与他们的关系没有妨碍毛对他的信任？难道毛真的视林为“娃娃”？聂没有交代这一点。答案只能是，在毛看来，林是自己人。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像聂这样对林彪的历史比较清楚的老同志在1971年之前没有反对林彪？

我们一些老同志同林彪之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同志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尊敬和信任，我们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我们如果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被排在毛泽东同志之后的第一名，这就事实上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如果说三道四就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了。（聂荣臻，1983：846—847）

“中央”就是毛泽东。但似乎又不能说明林彪“接班人”的位置是毛一人钦定的。张耀祠回忆，1968年10月17日讨论党章，江青、康生、张春桥提议把接班人写上，起草人向毛报告“大部分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子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以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毛泽东考虑了一个晚上后说：“既然大多数同志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张耀祠就此评论：“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那么几个人在为此事闹腾。有些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心里却不怎么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是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好附会和同意了。”（张耀祠，1996：115）张说有误，“只有那么几个人”无论如何是决定不了谁当接班人的，他们的“闹腾”不过是把毛的决定公开出来而已。“文革”爆发以后，林彪接班人的位置事实上已经明朗。按张的推论，则所谓“中央决定”不过就是几个人的“闹腾”。

聂荣臻的两个理由其实是一个：林受到毛的信任，所以大家无法反对他。杨尚昆说得好：“‘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一场长时期的、全局性的动乱。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无论哪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无法站出来公开反对。”（杨尚昆，2001：44）同样，如果有一天毛不再信任林彪了，大家也就可以批评他了。其实何止是林彪，任何一个革命者，不都区享此命运？

虽然如此，老同志中至少有一个人是敢于对林彪“说三道四”的，这就是陈毅。这位林彪当年的上级，不但1966年10月8日在小范围内认定林彪一定会当叛徒，1967年2月12日，他还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向归国留学生代表公开表示自己与毛泽东信用的人之间的距离：“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刘树发，1995：1187）背着1929年的老帐，陈毅是老同志中对革命体制认识最清醒也最敢讲话的一个，他的远见卓识已由历史证实。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尽管陈毅对毛泽东、对“文革”有过尖锐批评，毛也为此龙颜大怒，但

毕竟没有把他彻底打倒，并且还给予亲临其追悼会的殊荣。

参考文献：聂荣臻：1983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战士出版社。

## 【前事不忘】

###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 马失途 •

文化大革命从发端到现在，悠悠近四十载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已面目全非，我也由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变成年届天命的半老头。

近来从网上读了不少有关文革的回忆文章。有些作者与我同龄。看了他们的文章，激起自己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忆。受他们鼓舞，也想将自己的一些陈年往事记下来，以一个农村孩子的眼光和角度。

往事的确不堪回首，但那毕竟是我们的青春年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应该算是宗旨吧。

由于文革初自己年纪尚轻，许多所谓的经历只是道听途说。且无法印证。只能求抛砖引玉之效果，让当年真正的参与者们予以更正。刻不容缓啊！待我们这代人踏上黄泉之路，文革，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但愿是）绝后的浩劫，将被彻底地遗忘了。呜呼哀哉。

#### （一）风起云涌话初年

文化大革命应该说从六五年尾就开始了。其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学校和班级都组织了批判三家村的会，人人都写了批判文章或顺口溜之类的诗歌。还记得这样两句：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伙是一家。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正式始于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那么此前的批三家村就是山雨来前的满楼风了。这一年有印象的事还有一件，我的一篇作文在学校的墙报上贴出来了。题目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心里着实得意了一阵子。

五一六后就更热闹了。初中以上的学生都可以出去串联。我的一位表姐就去了北京。据说还见到了毛主席的身影，在敞篷汽车上一晃而过。即便是身影，也让她激动不已。当时有两句对联式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本村一位初中生没去北京，却全国到处跑了一圈。临行前带了两块五毛钱，回来还买了一把雨伞。令没有去串联的人后悔不已。小学生则只能心里羡慕，不能出去见外面的世界。要知道外面的世界对孤陋寡闻的农村孩子吸引力真是太大了。串联尾期，一位读高年级的堂兄从校长那儿开到了介绍信，组织一个小学串联队去天门县城关。我因父母反对未能成行，心里憋气了好几天。长到十来岁，连县城都没去过，更不用说下汉口，看火车之类的事了。小时候喜欢看书，书中描绘的大城市，大海及坐飞机等对我吸引力最大。心里常叹到：这辈子能逛逛汉口就好了！这辈子能看看大海就满足了！这辈子能坐坐飞机死也值得了！七八年春去武汉上大学，时年二十三岁，实现了第一个梦想。八六年赴法留学，终于坐上了飞机，也看到了大海。

这期间，各种造反组织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学校都以校，年级或班为单位，但不包括小学。农村则以生产大队为单位，且多是回乡务农的初高中生。开始还谦虚点，只称什么什么战斗队。后来级别越来越高，干脆都成了兵团，与大军区平级。兵团的名字也各种各样，多从毛主席诗词中摘录。东方红，井冈山最普遍。还有什么‘翻江倒海’‘全无敌’‘从头越’等等，不一而足。

足。威风凛凛的红卫兵们戴着红袖章，前面的旗手举着兵团的大红旗，不知有多气派。文革初还没有红小兵，所以我只能当观众。套用江岩生的话，就是观摩。但也有我的骄傲之处，就是我有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枚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以及一本红色塑料封套的毛主席语录。是一位在河北当兵的堂兄寄来的。毛主席像章挂左胸口上面，下面挂为人民服务，也够神气的。

小学虽没组织兵团什么的，但对学校走资派的批判还是免不了的。记得批判周元浩校长的会由一位刘姓民办老师主持。我因语文成绩较好且嗓音嘹亮被选为发言人之一。校长的罪状已事先拟定好了，分给我揭发的两罪状是：用毛选盖坛子和用领袖像垫床。会议开始，周校长先向主席像三鞠躬，次向革命师生三鞠躬，然后批判揭发轮流进行。我的发言稿事先已写好，并用毛笔誊写在一张大白纸上，当然经刘老师过了目。我也就照本宣科一番。其实周校长真是难得的好人。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学生和老师们从未大声讲过话。若干年后在麻洋读高中时碰到已调动工作的老校长，仍然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此后再没见过。老校长若健在，至少也有八十多岁了。

进入六七年，本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造反组织为了夺权而分裂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天门县的造反派称为‘红色造反者’，简称‘红者’。保守派称为‘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派’，简称‘无派’。县委书记孙连清支持‘红者’，县长都国伟支持‘无派’。都国伟这个名字很熟，因家父的一张奖状就是他签字的（父亲曾为模范饲养员）。区里的汪区长和公社的黄明玉书记也在‘无派’一边。说到黄明玉书记，还有一个小插曲。文革初，黄被打倒。我的一位读高中的表兄就将黄的自行车推回自用。有一天，表兄骑车来我们家，结果我们一晚没睡觉。三人（两位堂兄和我）学了整整一晚自行车。自行车被摔得鼻子不成鼻子，眼睛不成眼睛。表兄后来还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民办教师难转正）。

天门的所谓造反派保守派又都和武汉的相应组织挂钩。武汉的保守派名叫‘百万雄师’，主体是武钢武重武锅的工人。顾名思义，就知其人多势众。‘百万雄师’受到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支持。造反派则是后来有名的三钢（钢工总，钢二司和钢九一三）和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其中三新与钢二司为大专院校师生。钢工总和钢九一三则为武钢武重武锅的对立派工人。其实从中央到地方贯穿着两纵向主线。中央不是有二月逆流吗？中央的保守派大概是老师，付总理们，造反派则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我虽然因年龄小未投入到运动中，但当过一次小交通员。邻村的张全环时任县妇联主任，被造反派‘红者’禁在家中，要写大字报，却无笔墨。学校里一位老师（也是本房兄长）站无派一边，便派我与另一位小朋友给张送毛笔和墨汁。这是风起云涌的文革初期我的一次真正参与，但并非有意的。当然，标语还是写了不少。打倒刘邓陶王（任重），彭罗陆杨，‘红者’和‘无派’均无异议。但对孙连清和都国伟就不一致了。往往一派写打倒谁，另一派就在前面加一‘不’，然后对方在前面又加一‘不’，双方不断加‘不’，以求否定之否定，负负得正之效应。加到后来，也不知‘不’的总数是单还是双。中央级的打倒人员中（王任重大概只属湖北或中南地区），对杨尚昆所知甚少。后来无事翻看毛选后面的注释时，才知此公资格可老。且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

武汉的七二〇事件后，周总理亲到北京机场迎接谢富治和王力。中央的表态，使武汉的‘百万雄师’顷刻间土崩瓦解。陈再道被指责兵变而失去权力。部队支左转向。造反派们夺取了权力，纷纷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并开始了对保守派的清算。至今还记得一次批判公社黄明玉书记的大会。会议开始，几声断喝：‘把当权派黄明玉拉上台来！’‘把保皇派涂XX（公社文教辅导员）拉上台来！’‘把小爬虫马XX揪上台来！’这位‘小爬虫’就是派我送笔墨的老师哥。那次批判会呼口号我没参与，或者只跟着举了一下手。

稍后，中央召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批刘运动进一步推向广度和深度。农村除了刷上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标语外，还做了许多草人，极象孔明借箭的那种。草人一律大鼻子，影射为卖国贼。胸口上插上一树枝代替箭。其时，身为国家元首的刘少奇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来日无多了。中央不开除，他也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十多年后，这位已去世且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国家元首又恢复了荣誉。

## （二）浪花淘尽英雄

新生的红色政权稳定了一小段时间，造反派之间的争斗又开始了。真正印证了毛大爹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昔日同仇敌忾对付保守派的战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论战。而且这次不仅文攻，还有了武卫。也就是闻名的全国武斗。

武汉的钢派和新派翻了脸。据说机关枪迫击炮都发言了。我家附近有两集镇，均有三五千人口。也都在汉江边。上游的彭市成了新派，而下游的麻洋却与钢派挂上了钩。两镇之间常派人试探，我们在几公里外也能听到枪声和土制炸弹爆炸声。

武斗时期只有一事还有印象。当时，彭市镇革委会由田光头任秘书，掌管印把子。此人原是机械厂的工人，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因胆大好斗立了功，成立革委会时当上了秘书，各种文件均须由他盖章。有一次他的一位铁哥们写了‘与田秘书老婆睡觉’的字样让他盖章，他居然也给盖了。这位哥们顺手就贴在田光头背后，让彭市一镇人引为笑谈。田身为秘书，晚上多寝于革委会办公楼。有一次，麻洋镇派人夜袭彭市镇革委会，被田光头一人击溃。天明后，田逢人便说：幸亏我扔了一手榴弹，炸死炸伤多人，否则彭市镇就会被血洗。当时得意忘形，不料一年后深挖‘五一六’，狠批‘北决扬’，此兄早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本不用挖！第一批进了监狱。据说‘五一六’是北京的，代表人物是王关戚，杨付余。在湖北武汉就是‘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的缩写），鼓吹钢（派）新（派）长期斗，破坏革命大联合。

待武斗渐次平息，老人家突然发现青年人呆在城里闹事生非。于是乎来一个战略大转移，干脆都去农村边疆。此举可谓一举多得：安定城市，巩固边防，甩掉经济包袱。还有一点，就是知识青年多少可以带点知识到农村去。虽然老人家只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但同一位老人家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记得刚来的知青与农民贫嘴时，相互就是背诵这两段语录作为武器的。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这段最高指示下来时，我们公社正组织各大队文艺汇演。由于没通电，照明就用夜壶灯，即男人晚上用的尿壶，装满柴油，用旧衣服包破棉絮塞住壶咀，即为灯蕊。节目多是舞蹈和地主剥削贫农的短剧。中途突然节目暂停，公社革委会钟常委登上戏台，向全体观众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

下放到我们公社的都是青一色的武汉知青。除了少数投亲靠友的，绝大部分人举目无亲。先由公社分到大队，再由大队分到小队，结果我们小队没有！让我好失望。本打算队里来知青后，可向他们打听些城里的新鲜事或借点书看看，可这一愿望也没能实现。

虽然我们生产队没分来知青，但学校却加强了一位知青老师：杜欣平老师。其时我们小学早已毕业，但仍留在小学，称七年级。俗称小学戴帽。学校按军事编制，每班为一排，年级为连，学校称营。我被任命为营教导员。这是我毕生所当的最大的‘官’。据说大学本科毕业也只相当于连级。杜老师带我们的数学。个子高，白白净净，说话温和，当然一口汉腔。记得杜老师教我们唱过样板戏。早操后，全校集中在操场上，第一次学唱的好像是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



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我因数学成绩好，特别是因式分解和列方程解应用题得心应手，很受杜老师喜欢（大概天底下没有不喜欢好学生的老师）。学期结束，为鼓励或奖励我，或两者兼而有之，杜老师送我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和一本‘毛主席诗词’，红色塑料封套，封面上的字还描了金。就是这本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让我产生了对旧体诗词的爱好，此是后话。

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文化都革掉了，只有样板戏一枝独秀。农村各生产大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歌舞，样板戏片断以及革命性极强的地方小戏。脸谱化是必然的，演员一上场，就知是好人或坏人。我们学校的胃口比较大，决定排演红灯记全场。农村孩子很少有会拉琴的，所以二胡京胡均由老师操，剧中唱段也由老师教唱。演员都是学生，我被选出演李玉和一角。白天要上课，排演总在晚上或周末。汇报演出后，全体演员照了一张化妆照，没有加洗送给我们，只放大一张挂在学校的显眼处。我提着一盏马灯（代替红灯），站在最中间。演员同学中，印象较深的是‘王连举’，和我同班。他本也姓王。后来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班主任安排我给他整理讲学讲用报告。为此他还和我同住了一晚，向我讲述他的事迹。无非是生产队里的田埂垮了，奋不顾身地把田埂重新修好，避免秧田里的水流失掉。其间当然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现在‘连举’兄仍在家乡，成为村的父母官。曾听说他当上支部书记时尚未入党，后来追补的。看来这位昔日的‘叛徒’在新时期逸闻还不少。演‘鸠山’的同学没从政，却经了商。大概也成了什么款。扮演李奶奶和李铁梅的两位女同学因是商品粮户口（同一集镇上只有三四家吃商品粮的），被城里的企业招工了。‘李铁梅’好象在武钢。我们这些农村户口就只能永远呆在农村，心甘情愿地修补地球。

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晚八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联播节目报道了这一消息。我们立刻聚集到学校，然后敲锣打鼓，红旗引路，从学校出发，到附近的小集镇游行了一通。沿途高呼口号，口号停歇时，听到其他地方的游行队伍也在呼口号，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直到午夜方回，竟然一点也不疲劳。四月中旬，大会又发布了一次重大新闻，我们又游行了一次。四月二十四日，大会闭幕。又是红色电波传来，我们仿照开幕那天，折腾了半夜。这期间，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致敬信。开头千篇一律：不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就是引用毛主席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九大后，各级党委重新运作。一批老干部也恢复工作。随着王关戚的失势，从上而下开展了深挖‘五一六’狠批‘北决扬’的运动。大部分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日子都不好过。有的上午还是座上宾，下午成了阶下囚，那里等三十年四十年才分河东河西。前面提到的我们公社革委会的钟常委就重新回家务农。可能反差太大太快，适应不过来，造成神经错乱。当年的水利工地上，我就经常见他演讲，而听众却当马戏看。有人还故意逗他，引观众发笑。钟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农村至少也算个秀才。他的组织能力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他确有演讲天才。若干年后，在巴黎地铁上见一神经失常者作滔滔不绝的演讲，就让我想到了昔日的钟常委。还有一位革委会付主任，与我有点间接亲戚关系。确是一位有才有能力之人，可惜文革初站错了队。一生抱负难施展，直到改革开放才有转机，但年龄已大。我并不为这些人辩护，可当初的造反派头头既非上级任命，亦非买官卖官，全靠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演讲天赋取得群众信任。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中有些人或许是栋梁之材！人与魔鬼也就一念之差。只是在平和的环境里表现不出来。试问今日的贪官们，不也自称人民的公仆，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吗？人耶？鬼耶？

### （三）久旱禾苗盼甘霖

各级党委重新运作后，城市农村均趋稳定。虽然政治大国里运动是免不了的，但急风暴雨

式的革命是过去了。沉闷的生活中，突然一颗定时炸弹爆炸，林彪出事了。

其时我正在麻洋上高中。麻洋中学在文革前只是一所初中。文革中普及教育，小学升格初中，初中就升格高中了（就象如今的中专改大专，大专变本科一样）。我们的文化程度如何，由此可见一斑。记得七九级以后的大学生常说：七七级的高考试卷太简单了！须不知，对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林彪是湖北黄冈人。因重要人物多出自湖南，让一湖之隔的湖北颇觉惭愧。所以湖北出了一个身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小时候的我还是颇觉自豪的。虽然与万寿无疆的正统帅还是差一截子。

其实在传达文件之前，隐隐约约已有谣言在传播。先传达高级干部，然后县团级。先党内，后党外。先军内，后军外。层次相当分明，组织十分严密。但总有舌头长，嘴巴没上锁的。据说有些人因泄漏消息受到处分，比如开除党籍工作籍什么的。其实相差也就那么几天。真是‘祸从口出’。

当时传达的文件内容大多已模糊不清。只有两点还依稀记得一些。一是说三叉戟翅膀下有一洞，老人家却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二是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就悲观失望，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他。六五年，林彪重上井冈山后，写了一首诗或词，其中两句为：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为自己翻案。由此我想到，诗和眼睛一样，也是心灵的窗户。人们常说，酒后吐真言，梦里发心声。看来诗里也吐真言，发心声。当然那些马屁诗除外。另一例证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文件里传达的江青的诗：“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不满于自己文革前被打入政治冷宫。林彪江青尚且如此，看来诗里想藏尾巴也难藏住。

林彪折戟戈壁滩，自己一了百了，可忙坏了我们。所有红宝书中的再版前言，他的题词，讲话等均须去掉。他的头像也得销毁。林彪单独一个人的像还好弄，但他与毛主席有不少双人照，且离的很近，要把林彪剪掉，又不伤害老人家，的确不容易。此外，很多书甚至课本中都有林彪的影响。比如曾思玉所写‘踏雪访黄河’就收入了语文课本。总之，要把无所不在的林彪从生活中全部干净地清除掉，确非易事。幸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高度统一’，才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林彪事件后，政治风向开始转向。以前批判‘唯生产力论’，现在提‘抓革命，促生产’。并说工人不上班，怎能出产品？农民不种地，那来的粮食？教育战线上，以前批的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读书做官论’，白专典型，学而优则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等等，等等。现在则批判‘读书无用论’，提倡又红又专，要有真正的革命本领等等。连外语也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记得我们班还写了一篇批‘读书无用论’的作文。我在结尾里写道：革命是条船，学习就是帆。帆为船服务，船靠帆前进。老师用红笔画上波浪线，并在作文讲评会上宣读。

如果说我们中学阶段学了点东西，那就在七二年。可惜我们年底就毕业了。曾去过天安门广场的表姐听说我的成绩还可以，高兴地告诉我，大学可能直接从高中招生。我当时的确抱了一点点希望。幸亏所抱希望不大，否则失望愈大。一回乡就是五年，可通过高考入大学的事，却如泥牛入海，那里还有半点音息。且随着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教育战线开展了反回潮的运动。农村的干部们为推荐各自的孩子或亲戚已摆不平，需要干部们高超的政治智慧加以折衷协调。据说有的公社连八十年代的推荐名单都已拟定好。平头百姓的子女哪敢做大学梦呢。摘录我的几句顺口溜表达当时心情：

文革雨歇风稍停，大学初开尘封门。  
无端英雄交白卷，高考入学梦不成。  
五年农村干农活，泪水更比汗水多。  
城里知青尚下放，农家子弟欲如何？

大学梦一直要等到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才成为现实，此是后话。

七三年到七六年，虽在农村劳动，也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全国性的运动有批孔孟之道，几千年前的不为人知的少正卯突然平反翻案，成了反对‘克己复礼’的英雄。为胡适之‘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著名论断添了又一注脚。随后有‘评水浒，批宋江’。与农村有关的则有连年的学大寨，大干苦干拼命干，怎么也学不完，怎么也干不完。后来又添了一小靳庄，让农民夜夜唱歌，写诗。作为高中毕业生，除了自己写唱外，还要辅导其他农民，每晚子夜方睡，苦不堪言。好在只是一阵风吹过，农民们也不希望成为歌唱家或诗人，学小靳庄的活动也就不了了之。

这期间，有一项运动，我至今都不大明白。老人家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批资产阶级法权。生产大队开会传达文件，社员都要学习。毛大爹的原话我已忘记，只记得其中有一句：现在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说到这一句，还有一段笑话。我一侄儿其时正在小学读书，不知是自愿还是受学校派遣，他与另一红小兵一起，在通往集市的干道上设卡，要求每位过往的农民背诵毛主席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最新最高指示。大多数农民都背诵不出，他们也无奈，只好放行。这时来了有名的‘四喜哥’。何为‘四喜’？就是‘在家外人喜，在外家人喜，活着鬼喜，死了人喜’。在我们家乡，喜就是高兴的意思。可见这位老兄到了无人不厌的地步。侄儿知他难缠，本想放他过去。他却主动说可以背诵，但只记得一句。两位红小兵设卡多时也没碰到一位能背诵的主，此时也不免喜出望外。能背诵一点，也算进步。‘四喜’哥背诵道：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直把两红小兵听得目瞪口呆，却又无话可说。事后‘四喜’嫂埋怨他吃了豹子胆。他说：我一不是干部，二不是城里人，一个黄泥巴腿子，怕什么？谁还能取消我的农民资格？一副死猪不怕滚水烫的德性。回想起几年前在类似的场合，‘四喜哥’也曾大言不惭地背诵过‘老三篇’：人是要肿死的，但死的还不同意。中国古时候有个牵马的说过……老实说，‘四喜’哥还是有点才的，只是没有正常发挥渠道，就变歪了。

真的农民乐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只能甘居社会底层。这是怎样的弱势者与可悲者？‘四喜哥’只是不怕滚水烫，还有主动受滚水烫的。此人也是我们生产大队的。父母早亡，无人管教。平日游手好闲，被关进了监狱。布告上公布的罪行是奸污精神病人。刑满释放后，因总吃不饱，向公社要求重返劳改农场。值班的公社文书象听天方夜谭，跌破眼镜。七十年代初，我们那地方很多人确实饿肚子。家有老人小孩的，还能相互扯合。此汉单人独灶，人平每月三十多斤毛粮哪够吃。他这一荒唐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绝。几次要求不果后，他就故罪重犯，终于达到了‘二进宫’的目的。据他讲，在劳改农场不仅能吃饱，每月还有十来块钱的零用。所以，他宁做饱肚犯人，不当饿肚农民。所幸绝大部分农民都拖家带口，没人仿效。否则，沙洋农场怕要人满为患。

转眼到了七六年。与往年一样，农民们又忙于冬季水利工程。一天早晨，我正督促民工们出工，上汉江干堤加固堤防（时为大队水利工程师，本无行政权力，但水利队长拉我当差），突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报道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此前的大人物去世，讣告中一般只称党的一个损失或重大损失，这一次可是巨大损失。我也隐隐为国事担忧。

那时‘谣言’和小道消息很多。都是赞誉周总理的。其一：基辛格曾问周，为什么美国人

喜欢仰着走，而中国人却爱伏着走？取笑中国人都骑自行车，而美国人则开汽车。周巧妙地回答说：因你们走下坡路，不得不仰着，以求平衡。而我们走上坡路，就该伏行攀登。其二：基辛格问王洪文，世界上共有多少人？王洪文一时没有数据，面红耳赤，闭嘴不答。周代答道：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其三：邓小平带一兜苹果去医院看望周总理，周从中取出一小苹果让削。暗示将以‘小苹’开刀。等等。还传抄一首毛主席悼念周总理的词，还记得其中一句：巨星殒落大树倾，悲咽掩万家……也不知是真是假。

四月份，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无数的花圈，无数的诗词，无数的悼文……如此大规模的运动，自四九年共产党掌权以来，还是第一次。随后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报纸电台连篇累牍批判邓纳吉。聪明如邓公也成了‘二进宫’。

七月份又一巨大损失后（朱德），八月份唐山大地震。二十四万人一瞬间命葬残墙断壁。上苍似乎向中国人昭示着什么，可芸芸众生能懂得了吗？

这一年，湖北省撤区并社，彭市属新建制公社，没有旧区公所可利用，需修建公社办公楼。还是惯常做法，打人民战争，向各大队征调木工瓦工小工，作为水利工无偿摊派。此法自秦始皇修长城起，沿用至今。我也参加了基建办公室，任民工食堂伙食会计。九月九日下午三点钟我为食堂买蔬菜，在蔬菜门市部得知毛泽东主席去世。一下子觉得天要塌下来一样。想起自懂事以来唱的那些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也落山了。几十年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无时不笼罩在这一巨人的阴影下，而如今这阴影顷刻间消失。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种种的担忧一起袭上心头。

#### （四）沉舟侧畔千帆过

第一次看到‘四人帮’这个词，是在报纸上。人民日报通栏标题：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四版刊登了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按惯常说法，四人帮倒台标致着十年文革的结束。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按这一划法，本文就该打烊了。不然的话，就是出题跑题文不对题，至少也是画蛇添足了。

诚然，历史阶段的划分总得有一个具体的年限。但真正的历史却不能割断。其巨大的惯性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消解的。可以说，文革的余毒至今也没有完全清除。有的还改头换面，被发扬光大。曾被中央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时至今日仍是某种程度的禁区。难道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们还把持着权力？

四人帮倒台了。但政治运动继续。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有些人不运动就寝食不安。年龄大点的人戏称自己为老‘运动员’。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批判胡风，高饶反党集团，除四害，反右派，大跃进，大办钢铁，彭黄右倾集团，社教，四清，直至文革。有‘幸’经过这历次运动的人，总应该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吧。由于年龄关系，我对大跃进以前的运动不熟悉。之后的历次运动，也只能称有些印象。这其中，我对四清颇有好感。记得当时大小队干部都集中在公社里，日夜‘洗澡’，下楼过关。各生产队推选几名社员代表（当然是贫下中农），与上面派来的工作队一起清帐。贪污挪用者罢官。我们大队的张支书就是那次下台的。换了一位姓王的。也有人说，因王家姓大人横，张家姓小丁微，换班是必然之事。四清后，大小队干

部的作风焕然一新。群众心情舒畅，劳动热情高涨。六四，六五，六六三年，农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真正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恰逢学雷锋运动，很多人争做好人好事。我祖父为生产队车水一晚上，还不让人知道。这三年，虽然是人努力，天帮忙，但四清运动功不可没。与如今的土皇帝们比起来，当年的贪污挪用简直不足挂齿。当年挪用几十元钱要丢官，如今逛红灯区，一夜花去老百姓上千血汗钱，官照当不误。

回到正题上来。不妨按文八股将过渡时期作一粗线条回顾。

政治上，深揭狠批四人帮。对帮派分子办学习班，人人说清楚。当时公社办当时公社办公楼尚未竣工，剩下粉刷墙壁一项工程。正好用来隔离帮派分子。皮件厂有一彭姓工人，文革中为造反派，跳得很高。也被隔离在其中的一间办公室里。其时正值歌剧‘洪湖赤卫队’解禁，高音喇叭里整天都是王玉珍的歌声。这位彭姓造反派也在隔离室里唱。但他反复唱的总是那一句：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仇恨满胸膛。看来这家伙并不认罪。稍后我也参加了公社的清理工作队，恰好进驻皮件厂，与这位彭某斗争了好几个月，直至七七年首次高考。

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与既定方针的束缚，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对毛泽东晚年（岂止晚年！）错误重新评价。这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经过十年的压抑，人们开始感到心情舒畅。按官方的话说：一个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

组织上，清除了帮派分子。关在牛棚里还活着的老干部几乎统统官复原职。有人上，就有人下。稍后，报纸上也看不到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纪登奎等人的名字了。据说又出了小四人帮。包着羊肚巾的陈永贵伯伯据说回了山西昔阳。李素文大姐当然回原单位操起了纺织厂的旧活计。

经济上，城市里开始谈奖金了。甚至还挂帅了。利润也讲究了，还第一了。在农村，学大寨不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也不割了。有的地方甚至悄悄地干起了包产包干，打枪的不要。‘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关于万里，记得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也有说一说：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看来老万还是适应农村工作，铁道部长不好当。

文艺上，刘心武的‘班主任’开了伤痕文学的先河。反思的作品接踵而来。可惜后来左病复发，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也接踵而来。‘苦恋’遭批判了。‘假如我是真的’‘女贼’‘社会档案’等电影剧本也被枪毙了。据说后来台湾拿去拍了。不知确否。若如此，也就肥水不落外人田了。

科技上，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公提出：电脑要从娃娃抓起。蒋筑英的英年早逝唤起了社会对中青年科学家们的关注。但很快又知识贬值，‘原子弹不如茶叶蛋’‘手术刀不如剃头刀’。人们惊呼体脑倒挂。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矫枉已经过正。今日的白领们，豪车宝马，二奶小蜜，醉生梦死。对捡煤渣的老婆子当然管不了那么多。即使青梅竹马的黄脸婆大概也不屑一顾了。

教育上，恢复了抛弃十多年的高考制度。全国五千万人参加，争夺几十万个座位。实在蔚然壮观。也不知打破了吉斯尼记录没有？父子同考，夫妻双取传为佳话。我们班张大哥兄弟姐妹四人同年中举。虽然张大哥属扩大招收的走读生（走读生只召城里人），但毕竟实现了全家红。张家老爷子喜得合不拢嘴，连说祖上积德。张大哥与同班的李小弟的年龄之比，翻一翻，还拐一弯。七七级大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为农家子弟。真正是（或基本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今‘科举’制度虽还继续，但北京上海的录取分数就比某些省份低一百多分。省会城市也比其他地区低几十分。要知道，一分之差，可要管一批人啦！农民啦，就世代当盲流吧。

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本打算上大学还继续推荐一年，原因是时间太紧，高考的各项准备工作来不及。不料邓大人发了脾气，说一天也不能等了。这就是七七级春季入学的原因。七七级与七八级属同一年入学，只差半年。却高一级，占了半年便宜。只‘可惜’地方干部们精心制订的五年或十年大学生推荐规划从此作废。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参加公社揭批四人帮工作队。进入皮件厂的工作队共五人，四男一女。四个男人借住在皮件厂一职工家里。白天晚上各种各样的会。那位彭姓造反派又特别的顽固不化。我只能晚上开完会后复习一下。十五瓦的灯泡虽不够亮，但比家里的煤油灯还是强多了。物理化学在学校没怎么学，当时称‘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农基’。也没复习资料，只把高中课本反复翻读。很快考试就来临了。物理化学一张卷，一看傻眼了。电光声热和有机化学无异于天书一般。语文中的语法也没学过，根本不知‘补语’为何物。更糟糕的是，作文题为‘学雷锋的故事’。一时间想不起以前学雷锋的事，又不会编造，情急中将故事写成了感想。只有数学和政治遗憾少一点。数学试卷中有附加题一道，要求用导数求极大值。当时虽有时间，却无半点头绪。及至上大学时学了高等数学，才知其实很简单。

考试结束后，一段时间情绪很低落，总觉得自己名落孙山无疑。不想居然初试合格，通知体检，直觉柳暗花明。七八年二月底，终于盼来了入学通知书。工作队也正好完成历史使命。女队长说，本该评我为先进队员，但考上了大学，已有一喜。先进队员称号就优先其他队员吧。先进没当上，感谢房东的信还得我来写。也是些顺口溜。记得有这样两句：

每记鞋袜没有收，回来已是墙头挂。  
待我胜似亲儿女，多象当年沙妈妈。

后来听熟人讲，彭市镇上还有人专程去房东家看感谢信。并一致认定我考上了武大中文系。第一学期结束放暑假回家，还费了我不少口舌作解释工作。

大学梦终于做成了。一介农民进城吃商品粮。且每月还有助学金。对于一农家子弟，这是八辈子难碰的好事啊。去年写了一段顺口溜回忆当年情形。抄录几句：

峰回路转七七年，拨开乌云始见天。  
垂头丧气出考场，蓑衣斗笠复耕田。  
严冬过后春意阑，民工行装下武汉。  
满手老茧初拿笔，一顿犹吃八两饭。

说到吃商品粮，还有一段笑话。我一邻居比我大十岁左右吧。文革中参加不少三线建设。什么远安，〇六六工地等，一去几个月。因路远，无法带足粮草，就去转‘支拨’。也就是用自家的粮食去本地粮站换支拨证，然后凭此支拨证到三线建设驻地的粮站换回粮食。八八年我从法国回家探亲，这位邻居很为我在法国的粮食问题担心。问我是否也转支拨？我一时没有会过意来。待到明白他之所问，把我笑得差点闭气。

由此我又想到，中国的农民对国家的建设实在是功不可没。历年冬春两季的水利建设都是无偿的。当然对三线建设召的民工，国家还是付一点工资。每月十八元五毛。俗称‘十八块半’。工资虽低（相当于城里学徒工），且不管粮食，但对农民吸引力很大，尤其对尚未成家的年轻人。尽管通过支拨证，农民们拿去的是新粮，换回的是霉米。

## （五）十年荒漠泪与血

既然题目是文化大革命，当然得专题谈谈文化。其实文化大革命应读成‘大革文化命’才符合实际。封（中国几千年）资（西方资本主义）修（苏联及东欧）统统一扫光。只剩下马恩列斯毛，还有霍查同志的著作。后来再加上鲁迅。正所谓：百业诸废唯政治，四卷雄文喂饥肠。（摘自本人顺口溜）

当年正是酷爱读书的年龄段，真象列宁所说，一个饥饿的人伏在面包上。可我们当时却无面包。只能给什么吃什么，找到什么吃什么。

#### ◇ 吃传单

天门离武汉不太远，且交通还算方便。一夜轮船就到了汉口。文革初从武汉来的传单特别多。

其中经常看到一份叫‘红水院’的传单。专门揭露王任重陈再道钟汉华等省及军区领导并夏菊花等文化界名人们的‘丑闻’。也是从武汉来的传单上，我读到了当时我最喜欢的两首自由体诗：‘放开我，妈妈’和‘孩子，去吧’。大概出自‘钢二司’武大才子们的手笔吧。当时我就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并妥善保存。后来‘深挖五一六，狠批北决扬’时，害怕引火烧身，悄悄地处理掉了。直到现在还后悔不已，因为再没找到这两首诗。虽然诗中尽是革命词汇，但当时确令我激动不已。凭记忆，现在还记得如下几句：

##### 第一首

放开我，妈妈，  
.....

我不愿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  
去迎接……冲刷。  
.....

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儿愿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

##### 第二首

孩子，去吧，  
我不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小小的雀笼怎能锁得住羽翼丰满的小鹰，  
低低的羊栏怎能关得住四蹄翻飞的俊马。  
.....

董存瑞有爱子的母亲，  
黄继光也有疼儿的妈妈。  
.....

真是无巧不成书。文革收场后，我考入了武汉水电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与教研室老师们聊起来，方知昔日的‘红水院’就是水电学院的造反派刻印的。水电学院在文革中也是风头

出尽。就象北京的天派地派一样。

#### ◇ 吃毛选毛诗词

其实文革中也不能说绝对无书可看，我们家就有毛选两套。当年请红宝书和毛主席的石膏像可是载歌载舞披红挂彩请回来的。而且免费，这对农民们至关重要。若要用卖鸡蛋的钱去换，恐怕母鸡们的屁股会肿大一截。免费固然好，只是那石膏像太容易碎。万一从神坛上摔下来，一家老小的性命……所以家家都捏着一把汗。

我因无书可读，阴雨天憋在家里，拿出毛选来乱读。开始顺着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然后跳着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别了，司徒雷登’……后来发现文章后面的注释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于是就专读注释。党史知识增加不少，可惜白费，一辈子没捞到党票，连入党申请书都没交过。记得大学期间，学生宿舍入门处的黑板上常有这样的通知：今晚党员同学与要求进步的青年学党章云云。所谓要求进步的青年就是写过入党申请书的。咳，当年不要求进步的青年变成了不要求进步的老年！

毛选翻完后，又无书可看。幸亏杜老师送我一本毛主席诗词。古典诗词以前从未接触。虽然后面有注解，但什么‘共公’‘不周山’，读来还是一知半解。但消化不良也不能不吃。越不懂越佩服老人家的博大精深。如今人届天命，从网络上读了一些古代的现代的诗词，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最近将毛诗词重新下载，重读一遍。其中两首较欣赏。一是‘忆秦娥·娄山关’，二是‘浪淘沙·北戴河’。此外，‘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及‘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等句我也喜欢。至于‘水调歌头·鸟儿问答’一调，七六年元旦播放时，我就大吃一惊。虽然我对旧体诗词的格律一点不懂，但该词中用语也太匪夷所思。

#### ◇ 吃鲁迅

回想起来，文革中幸亏还有鲁迅可读。否则真是一遍空白。有人觉得鲁迅过于尖刻。或许与文人们论战时，确实有点。但鲁迅小说对国人的刻划，至今还有现实意义。‘故乡’和‘祝福’我特别爱读。儿时的玩伴中，我总看到不少闰土的影子。祥林嫂也不是绝无传人。另外高中时，课本中收入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读后竟能一字不错地背出。如今也还记得不少。

鲁迅的旧体诗也是那时读的。记得老师教我们读‘挈妇将雏鬓有丝’中的‘雏’读音成‘C H O U’。前两年，我学作一首七律？赠留美同学，用了‘雏’字，造成出韵（也不知其他是否压韵）。其原因盖出于鲁迅的诗和我们的地方口音。抄录如后：

一洋难容两地愁，君留北美我滞欧。  
壮志已随流年去，余生只剩两鬓秋。  
故国长离非缘贫，他乡且住只为雏。  
把盏江城应有日，黄鹤楼上两白头。

直到用中文之星拼音法敲字时，才知道‘雏’读音为‘C H U’。一时间还真找不到什么字来代替，又不想改变原意，只好作罢。

鲁迅的诗中，除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外，‘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我也很喜欢。只是不知道后面这两句的出处了。

前些时看了黄宗英一篇回忆文章。记叙当年反右时毛主席关于鲁迅的一段话。大意是：鲁



迅若健在，五七年要么当哑巴，要么进监狱。因有感，作一顺口溜，也抄录如后：

钦定旗手骨最硬，匕首投枪伴一生。  
阎罗晚召二十年，头号恐非章伯钧。

果真如此，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恐怕就难以横空出世了。

#### ◇ 吃堂兄课本

三位堂兄中，大堂兄初中读了一年便辍学。二堂兄坚持读完初中。一箱子书放在楼上。我因无书读，便打了这一箱书的主意。农村的阁楼上仅靠一片亮瓦透点亮，让我想到一句谜语：凿壁偷光看夜书，孔明。书箱上满是灰尘，大概堂兄回家务农后从没摸过。堂兄的课本保存得很好。我选出自然，地理，历史和语文课本，一本一本地读。我们的初高中没上过自然，地理，历史等课，我的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就是从一片亮瓦下读来的。也不知眼睛近视了没有。农村人哪管这个。

八四年我已留校任教。记得在Y老师家看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各国运动队出场时，其英文国名我一下子就能用中文说出来。连留美的Y老师也感惊异。这些地理知识就是从堂兄的课本上读来的。当时虽属顺口说出，但有不少自我表现的成分。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脸红。

#### ◇ 杂吃

文革中的报刊除了‘红旗’外，几乎都停刊了。报纸还有些。但从中央到省市都是党报。我对报上的诗歌比较留意。那时的诗歌都洋溢着革命激情。除了读以外，特别好的还抄在本子上，印象就更深刻些。现在对其中两首还有些印象。

一首题为‘毛主席去安源’：

你胸中滚动着世纪的风云，  
脚下踏着崎岖的山冈。

.....

象春雷回响在人们的耳边，  
象春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象春风吹绿千里沃野，  
象春汛掀起万丈狂澜。

.....

另一首题为‘长城颂’，好象是一位徐姓诗人所写。只记得一句：月黑风高，鼓楼上你警钟长鸣。因这一句常让我想起‘月黑杀人夜，风高防火天’，故此记得。

初中语文老师也教过几首诗。其中的‘某公三哭’和‘老虎贴告示’属政治讽刺诗，当时都能背诵。现在虽还记得一些，却无论如何也背不全了。

此外，老师还让我们抄了些警句。如‘大海之所以那样宽阔，是因为它处在江河湖泊的最下面’‘柔软的沙发容易使人昏昏入睡，但崎岖的山路却能使人精神焕发’‘熬过寒冬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渡过长夜的人最懂得光明的可贵’等等。

除了喜欢读诗，自己有时也乱写一气。也是初中时，老师出一作文题，两节课完成。作文题目已忘记。当时我怎么也写不出。并且越急，脑子越不管用。临放学时，写了一首诗交差：

天边乌云闷雷响，杨柳低头泪汪汪。  
咬断笔头捅破纸，坐在学室思断肠。

本以为闯了祸，不想老师反而高兴。称为打油诗，并读给同学们听。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打油诗’这个词。

高中阶段，有一次作文要求写诗歌。题目是：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三十周年。这首诗很长，只记得开头几句了：

大海鼓起百万排浪花，  
长空布上美丽的图景。  
东风牵着喜信奔走相告，  
欢乐的节日带着千万朵红花翩翩来临。  
.....

老师给的评语是：情文并茂。又让我得意了一阵。

高中阶段还写过一首长诗，题目是‘小英雄’。不是作文，是我为表扬好人好事写的稿。以我们班上一同学为原形。现在一句也记不起来了。大概都是些肉麻的话。一次无意中发现邻桌同学的本子内抄录了‘小英雄’。书写相当工整。看来还是作为好诗抄下来的。

总之，文革十年，我们吃狼奶长大。除了些革命语汇，腹中空空。更惶论中华文化的底蕴。前几年作文革反思，写了几句顺口溜：

青春年华遇文革，十年荒漠泪与血。  
往事如烟成惊梦，羊毫在握重如铁。

行文至此，自知思绪混乱，东窜西突，信马由缰。就此打住。否则王婆婆的裹脚，越拉越长，徒惹厌恶。近几年学填旧词，因不懂格律，仅按字数句数填满。并只限小令，从不敢涉足长调。想文革一题，岂能三言两语带过？故勉强为之，曰满江红。又因前次画蛇添足，文革改革过渡期也略带一笔。不谈改革，恐生妒忌。再勉强为之，曰水调歌头。均抄如后，聊作结尾：

#### 满江红·文革

平生噩梦，最难忘，十年文革。一声令，举国造神，漫天马列。上山下乡献青春，文攻武卫洒鲜血。惜一代精英入迷途，竞狂热。

关工矿，荒学业。废纲纪，弃道德。叹民生潦倒，国脉衰竭。巨龙蜕为井底蛙，睡狮犹作梦中客。盼中华骏马长奋蹄，避覆辙！

#### 水调歌头·改革

十年浩劫后，改革春风来。温雨滋润大地，百花争艳开。农村包干包产，城市流通交通，

高考拔人材。真理实践验，政绩民心裁。

启国门，硬发展，淡形态。实现长治久安，经改复政改。规范市场经济，完善选举制度，双剑击腐败。农民轻负担，下岗有安排。

□ 寄自法国

~~~~~

## 【资料汇编】

### 文革中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 欧阳龙门 •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也就是实现了当时所说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这29个、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当中，有21人是军队干部，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所以可以说成立革命委员会就是军管，只不过在加上几个干部和群众代表。越到后来越是如此，这表明了毛泽动急于利用军队结束文革、恢复稳定的心态。

按说这些革委会的主任都是在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在走资派遭到整肃以后上台的，都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用当时的话来说，这些人都应该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了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然而这些人当中几乎一半人后来还是遭到了整肃。

第一阶段的整肃是在“林彪事件”以前，遭到整肃的，共有6人，他们是：

山西的刘格平，1969年7月被免职。69军军长谢振华接任。

贵州的李再含，1969年10月被撤职。54军副军长蓝亦农接任。

河北的李雪峰，1971年1月被撤职。文革前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接任。

山东的王效禹，1971年3月被撤职。济南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接任。

黑龙江的潘复生，1971年6月被撤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家道接任。

内蒙的滕海清，1971年5月被免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接任内。

在这些人当中，山西的刘格平、贵州的李再含、山东的王效禹、黑龙江的潘复生这四个人都是文革早期出来表态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贵州的李再含还是军队干部。这些人所在的省都是成立革命委员会较早的。正因为如此，在文革的进一步动乱中，这些成立较早的革命委员会和这些主任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使这些省长期不能稳定。

与黑龙江的潘复生具有可比性的是河南的刘建勋，都是文革前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是在文革初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表态支持造反派。与贵州的李再含具有可比性的是青海的刘贤权也是在文革初期支持造反派，而且都是军队干部。由于刘建勋和刘贤权没有过深地卷入派性斗争，因而度过了这一轮的整肃。

河北的李雪峰是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因为陈伯达下台而受到了牵连。

毛泽东批判陈伯达实际上是为了打击林彪。李雪峰和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因为过分接近陈伯达，被毛泽东认为是追随林彪，于是遭到整肃。毛泽东把整肃李雪峰和郑维山作为打击林彪集团的一项措施，称之为“挖墙角”。李雪峰和郑维山都在“林彪事件”以后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平反。内蒙的滕海清是在制造著名的“内人党”冤案中犯了严重的罪行，致使34万6千多人遭到迫害，1万6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内人党”冤案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平反。滕海清在当时只是调离内蒙，并没有真正受到处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内蒙人民曾强烈要求惩处滕海清，但是滕海清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甚至没有一个对错误的深刻认识。

在这段时间里，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变动情况还有：

云南的谭甫仁，1970年12月遇刺身亡。文革前的云南省省长、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接任。

西藏的曾雍雅，1970年12月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军区政委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任荣接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林彪事件”以前，接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基本上还是军队干部。到“林彪事件”为止，29名主任中的军队干部上升到23人几乎占了百分之八十。这时候毛泽东的思路仍然是利用军队实现稳定。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以后，有4人受到牵连下台，他们是：

广东的黄永胜，1971年9月被撤职。在此之前已经调任，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接任。

浙江的南萍，1972年被撤职。文革前的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接任。

江西的程世清，1972年被撤职。文革前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接任。

新疆的龙书金，1972年被撤职。文革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赛福鼎接任。

此外还有2人去世：

北京的谢富治，1972年去世。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接任。

四川的张国华，1972年去世。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接任。

至此，一共有10人遭到整肃，占了百分之三十四。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除了去世的3人以外，遭整肃的10人以及西藏的曾雍雅都未能进入十届中央委员会。所以，26名在世的主任当中只有15人成为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仅为百分之五十七。

1975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江苏的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江苏省委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湖北的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安徽的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此前已李德生调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安徽省委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辽宁的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福建的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林彪事件”以后接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基本上都是文革前的省委干部。老毛这时候的思路和周恩来趋向一直：大量解放和起用文革中的老干部，同时让文革权力过分膨胀的军队退出地方领导岗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有4人遭到整肃：

上海的张春桥，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文革前的海军政委苏振华接任。  
吉林的王淮湘，1977年免职、调离。文革前的新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接任。  
甘肃的冼恒汉，1977年案被撤职、降级。甘肃省委副书记宋平接任。  
除此之外，北京的谢富治虽然已经去世，后来还是遭到清算。

去世的2人：

宁夏的康健民，1977年病逝。文革前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任。  
贵州的李再含已被撤职，1975年去世。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除了遭到整肃的三个人以外，青海的刘贤权也未能进入十一大的中央委员会。

24名在世的省革委会主任当中，进入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总只有10人，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

江苏的许世友、天津的解学恭、河南的刘建勋、湖北的曾思玉、湖南的黎原、  
安徽的李德生、陕西的李瑞山、辽宁的陈锡联、福建的韩先楚、广西的韦国清。

最初的29名省革委会主任当中，先后遭到整肃的一共是14人，几乎一半。

附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黑龙江（1967。1。31）：潘复生——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为第一书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开始后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军区政委。九届中央委员。1971年6月被撤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家道接任。1980年去世。1982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黑龙江省委的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革中的错误不做组织处理。

山东（1967。2。3）：王效禹——文革前任山东省青岛市委副书记。文革中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委员。1971年3月被撤职。济南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接任。1979年被开除党籍。

上海（1967。2。5）：张春桥——文革前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文革前的海军政委苏振华接任。1977年7月，被永远开除党籍。1981年1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4年死于狱中。

贵州（1967。2。14）：李再含——1955年授大校军衔。文革前任贵州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文革中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10月被撤职。54军副军长蓝亦农接任。1975年去世。

山西（1967。3。8）：刘格平——文革前任任山西省副省长。八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委员。1969年7月被免职。69军军长谢振华接任。1976年底，调回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去世。

北京（1967。4。20）：谢富治——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中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去世。文革前的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接任。1980年被开除其党籍。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鉴于其已死亡，决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青海（1967。8。12）：刘贤权——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文革中任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九届、十届中央委员。1968年调任铁道兵政委。文革前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浙江革委会主任谭启龙接任。1992年去世。

内蒙（1967。11。1）：滕海清——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九届中央委员。1971年5月，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的错误，被免职。调回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接任。

天津（1967。12。6）：解学恭——文革前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为第一书记）。文革开始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文革中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委。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江西（1968。1。5）：程世清——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26军政委。文革中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因“林彪事件”被撤职、隔离审查。文革前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接任。后被开除党籍。1981年解除关押。

甘肃（1968。1。24）：冼恒汉——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文革中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届中央委员。1977年因“四人帮”案被撤职、降级。文革前的兰州军区国防工办副主任、当时的甘肃省委副书记宋平接任。1991年去世。

河南（1968。1。27）：刘建勋——文革前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中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3年去世。

河北（1968。2。3）：李雪峰——文革前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开始后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中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年1月，李雪峰因“陈伯达案”被撤职。文革前的河北省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接任。1979年12月改正。2003年去

世。

湖北（1968。2。5）：曾思玉——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5年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为第一书记）赵辛初接任。

广东（1968。2。21）：黄永胜——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八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总参谋长。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9月因“林彪事件”被撤职。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兴元接任。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83年去世。

吉林（1968。3。6）：王淮湘——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文革前任16军政委。文革中任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九、十届中央委员。1977年2月，因“四人帮”案被免职，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文革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接任。1980年被开除党籍。

江苏（1968。3。23）：许世友——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为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接任。1985年去世。

浙江（1968。3。24）：南萍——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文革前任20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4月因“林彪事件”被撤职，隔离审查。文革前的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接任。1981年解除关押。1989年去世。

湖南（1968。4。8）：黎原——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文革前任47军军长。文革中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调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47军军长。文革前的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为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接任。

宁夏（1968。4。10）：康健民——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1977年病逝。文革前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任。

安徽（1968。4。18）：李德生——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12军军长。文革中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等职。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副主席、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调任总政治部主任。文革前的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为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接任。

陕西（1968。5。1）：李瑞山——文革前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第一书记）。文革中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调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文革前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接任。

辽宁（1968。5。10）：陈锡联——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接任。1999年去世。

四川（1968.5.31）：张国华——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藏军区司令员，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文革中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去世。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接任。

云南（1968.8.13）：谭甫仁——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工程兵政委。文革中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1970年遇刺身亡。文革前的云南省省长、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接任。

福建（1968.8.14）：韩先楚——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75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接任。1986年去世。

广西（1968.8.26）：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广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广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总政治部主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九届中央委员、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文革前的广西区委书记处书记、当时的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安平生接任。1989年去世。

西藏（1968.9.5）：曾雍雅——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12月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军区政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任荣接任。1995年去世。

新疆（1968.9.5）：龙书金——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湖南军省区司令员。文革中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因“林彪事件”被解除职务。文革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赛福鼎接任。2003年去世。

□ 资料来源：各省、市、自治区大事记，历届党委、政府人员名单。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